

〔美〕本·巴格迪坎著

传播媒介的垄断

一个触目惊心的报告：五十家大公司
怎样控制美国的所见所闻

新 华 出 版 社



2 030 9531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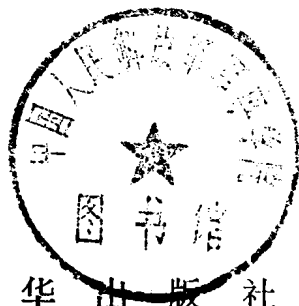
传播媒介的垄断

——一个触目惊心的报告：

五十家大公司怎样控制

美国的所见所闻

〔美〕本·巴格迪坎 著



新华出版社

The Media Monopoly

A startling report on the 50 corporations that
control what America sees, hears and reads

Copyright © 1983 by Ben H. Bagdikian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传播媒介的垄断

一个触目惊心的报告：五十家大
公司怎样控制美国的所见所闻

〔美〕本·巴格迪坎著

林珊 王泰玄 于华译
范东生 王志兴

于友校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插图2张 186,000字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3,250册

统一书号：7203·141 定价：1.85元

6. 44
05

译者的话

美国新闻传播工具的集中和垄断，是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和垄断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如果说，过去美国的垄断资本是采取直接收买和兼并报刊、电台和通讯社来垄断新闻传播工具的话，那么，今天美国的垄断资本则已在垄断的方式上有所发展了，它们通过连锁董事会或多种经营公司等形式来垄断和控制各种新闻传播工具。这本一九八三年美国出版的书，以许多实际事例，描述了最近二十五年中美国的五十家大公司对于美国传播媒介的集中控制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大公司又与其它大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经济上形成了极为密切的连锁关系。同时，本书还描述了大量的广告对报刊、广播、电影等这些传播媒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深远影响。本书作者认为，这种垄断的后果是：编辑和记者都不得不在新闻和评论的内容上屈从于垄断资本的利益。因而五十家大公司通过垄断半数以上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也就在实际上控制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精神食粮。

本书作者本·巴格迪坎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媒介的评论家，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新闻研究院。他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三十

多年，担任过《华盛顿邮报》副编辑主任，并经常为美国的一些著名报刊如《哈泼斯》、《大西洋》、《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和《纽约时报》等撰稿。他还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美国新闻学院负责人协会曾称他是“新闻学界最有洞察力的批评家”。他在本书中提供的丰富资料和所作出的论断，对于我们考察和研究美国新闻工具以及美国的新闻自由问题，无疑是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从书名到内容都采用了西方盛行的“传播媒介”一词，因为“传播媒介”除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工具以外，还包括图书、唱片、录音带、电影等，其涵义不止是我们一般所指的新闻工具，所以，我们在译文中保留了“传播媒介”的译名，而没有译作“新闻工具”。

尽管作者对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美国新闻传播媒介作了较有力的揭露，但看得出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事业是带有资产阶级偏见的，希望读者注意分析。

限于水平，译文一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前 言

从前，作为一名罗得艾兰州普罗维登斯市的年轻记者，我常常到玛丽和道格拉斯·戴纳开的旧书店里屋喝茶。道格拉斯是一位面颊红润的苏格兰人，他会抽出他在初版书中最新发现的书，而玛丽则会预言他将保存这本书并永不卖掉它。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道格拉斯给我看了一本初版书，它对我的报道生涯产生了影响。这本书名叫《萨柯和万泽第书信集》，是由马里恩·登曼·弗兰克福特和加德纳·杰克逊编辑的。

我知道曾经有过一个“萨柯和万泽第案”。我七岁那年这两个人在波士顿查尔斯敦监狱被电刑处死。我只听到人们肯定地说这两个意大利人是杀人犯，说电闸接通了他们的电椅的时候产生了一股强大的电流，以至十五英里以外的我的家乡斯通汉姆和麻省东部所有地方的电灯都闪了一下。那时我尚在童年，还没有思考能力去怀疑他们的罪行，也记不起我对这次死刑有什么保留意见。但我被吓坏了，当时成千上万个家庭闪过的黑暗记录了两位罪犯的死亡。

这就是当我第一次看见道格拉斯·戴纳的那本印刷精美、装

订牢固的书时，所知道的萨柯和万泽第的所有情况。当我翻动书页的时候，我的眼睛看到反复出现的艾丽丝·斯通·布莱克韦尔的名字。艾丽丝·斯通·布莱克韦尔是一位女编辑和作家露西·斯通的女儿；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曾与那两位囚犯交过朋友。我记得曾看到过我母亲写的一首献给她的朋友艾丽丝·斯通·布莱克韦尔的诗。我对艾丽丝·斯通·布莱克韦尔感兴趣，所以道格拉斯·戴纳勉强地把这本书卖给了我。

阅读了萨柯和万泽第的书信，我开始了一次在后来几年中占了我许多空余时间的报道活动。这次报道活动引导我去寻求萨柯和万泽第为什么被据以错误地定罪并处死的一种明确的解答。我了解到这两个人被处以电刑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地方的灯都闪了一下。但我大量阅读了审讯副本、审后宣誓书和申诉、官方报告、对在世时的主犯的访问记、以及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记述这一案件的书籍，我也从中懂得了一些报纸的社会作用。

萨柯是一个修鞋匠，万泽第是一个鱼贩子。由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南布伦特里有位工资出纳员和他的助手遭暗杀，他们被逮捕了。这是一起残酷的凶杀案，是五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行道上干的，他们开着一辆车跑掉了。萨柯和万泽第是意大利移民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被捕时，全国正处于一种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的激起是由于对几年前俄国革命的恐惧，由于对所有“外国人”的地方的偏见，由于群众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一种受蒙蔽的观念，以及由于美国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利用司法部打击所有激进分子，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几乎是全国性运动的“帕尔默搜捕”。

在大逮捕时期，大多数报纸支持“帕尔默搜捕”，而且尽管有难以否认的证据证明审判严重不公，这些报纸还是竭力主张给

萨柯和万泽第定罪。新闻界是反映各种事物的镜子，这或许可以说明它本身对于这种歇斯底里的反映和促进。但是，由于它数量众多和形式多样，在它们的报道和评论中提出理由和各种各样的意见，它也被当作一种舆论的钟摆。而这个钟摆不曾起到作用。

到1927年萨柯和万泽第将被电刑处死的时候，大多数严肃报纸已经改变了看法。记者们证实了该州弄虚作假并隐匿证据。编辑们也开始确信审判严重不公。但太晚了。到这个时候，傲慢的马萨诸塞州已经决定把那两个被告处死。州政府固执己见，拒不改判，其原因，按参与此案、令人景慕的律师赫伯特·厄尔曼的说法，改变的话就会“揭露我们社会秩序中的一个弱点”。

在美国，我们依靠大众传播媒介来揭示各种事物，其中包括“我们社会秩序中的弱点”。1921年，当这两个人被审讯的时候，虽然有大量证据支持，报纸却没能作出这种社会秩序有弱点的揭露。到1927年，当这两个人被电刑处死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报刊已经改变了态度。这种改变没有救活那两个人，但它道出了传播媒介的一些问题。

这种教训曾在我后来的记者工作中多次重复。新闻媒介并非铁板一块。它们并不凝固为永久不变的一套标准。但是它们大受本身固有偏见之苦，这种偏见保护公司的权力，并因而削弱了公众对造成美国社会景象的各种力量的理解力。这些维护现状的偏见，象在萨柯和万泽第案中起作用的偏见，看来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当约瑟夫·麦卡锡取得蛊惑人心的权力时，他运用这种权力正如三十年前A·米切尔·帕尔默所做的一样，也同样得到大多数报纸狂热支持。为了吹捧麦卡锡，这些报纸必须放弃如实记载和作出批评性判断等报道原则；它们竟这样做了。

在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崛起的那段时间，在我偶然按惯例替补外勤记者的时候，北部和南部大多数最好的地方报纸往往对我说，在它们的“有色人种区”不存在什么严重问题。然而在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爆发了甚至使地方传播媒介都吃惊的种族暴动。

当我在六十年代早期报道由于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贫穷时，在一些最好的报纸的编辑室里，我又一次被告知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但是几年之后事情清楚了：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早就存在了。

然而同是这些报纸，如果我问起关于福利事业中的骗子、低级的政治诈骗、或任何公共机构的缺点一类的问题，这些报纸的图书馆却满是这种剪报资料。

看来，这里有一种双重的标准：对公众团体的缺点很敏感，但对私营企业部门特别是大企业同样重大的缺点却不敏感。这种习惯性的偏见不仅仅保护了大公司制度，还剥夺了公众理解现实世界的机会。

我们的现实状况并不在一次卓越的展示中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主要由大众传播媒介展示的通常并不显眼的世界图景片断中积累起来的。只要在决定哪些片断重要的时候有一种公正的模式，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就是有生气的、逐渐丰富的和自我校正的。但是当某一类重要的片断被放过或仅仅模糊地反映时，我们的社会—政治世界观点就是不充分的。这样，人类最大的智力，即对各种事情的原因和结果的辨别力就受到了损害，因为这种智力依赖于对各种事情发生的次序和意义的知识。当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部分环节变得模糊时，我们的弱点和力量的根源就都变得不明确了。因为我们据以指导社会行动的认识漏掉了一些东西，错误便每隔十来年就重复一次。

我个人的联想、职业经验和研究告诉我，新闻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和节目制作人作为一个整体，是有能力揭示种种事物，包括“社会秩序中的弱点”等现实状况的。但是为表现这种变化多端的状况，他们必须通过一些居主导地位机构来进行工作，而且这些机构必须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形成我们对现实社会看法的最重要的机构如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书店和电影制片厂日益成为它们的偏见的最稳固的受益者的资产，那么写一写这个问题看来就是很重要的了。

绪 论

每一个领袖，无论他是专制暴君，还是宽厚的先知，他的梦想都是支配其人民的行为。

科林·布莱克莫尔：《心理的结构》

据说歌德只读时间过去一个月以后的报纸，因为这有助于他避免知道一些时事。迈米·伯德·金是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一位古怪的贵妇，她热衷于沉湎于过去；她让她的男管家每天早晨拿一份报纸存放在地下室里，而给她带来一份二十年前同一天的报纸。拿破仑说他喜欢推迟刊印新闻直到它不再产生任何影响，而这也就意味着把它永远推迟下去。

当代美国人却有他们不同的需要。他们不象歌德那样，由查尔斯·奥古斯塔斯公爵供养。许多美国人也不象迈米·金那样，有一些仆人使他们生活在回忆之中。即或他们象拿破仑那样讨厌新闻，他们还是需要一些不可推迟的消息，例如关于他们的孩子的学校、关于他们劳动生活中的变化、关于决定他们前途的当地和全国的政治、关于可能夺走他们的汽油和儿子的国际事件等。或者干脆来一场核战争，最终结束可供新闻报道的任何东西，从

而可能使拿破仑称心如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上，以至持续和及时的信息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的环境不是歌德的萨克斯一韦默宫廷中的贵族寓所，不是迈米·金的宅第，也不是拿破仑的流放地厄尔巴。我们生活在一个能动的世界上，对经济和政治变化一无所知会危害民主，并且无法作出明智的决定。

美国人象大多数人一样，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以及电影里获得对世界的印象。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甚至残暴的力量也只有通过创造一种接受残暴者的态度才能获得胜利。

当权者早已认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闻和各种意见的人就具有政治的权力，这就是揭露或隐藏、宣布一部分而隐匿另一部分、秘而不宣直到机会来临、事前决定如何解释所揭露的事实等权力。民主国家领袖都珍爱控制思想的权力，不亚于巫医、宗教巫医、国王和独裁者；他们象渴望控制军队那样渴望控制信息。

受控制的信息具有一段病态的历史。它病态不仅仅因为它违反民主观念，尽管它确实违反了。它病态是因为它通常都是错误的。没有不同意见的信息本来就是有缺陷的信息。如果它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它就不易更正。即使它当时是正确的，不久也会过时。如果它不是根据现实世界作出无约束的反应而改变，它就会变得与现实世界相脱离。要真实地反映社会，就不能有中央权威这样的东西。

但是，有权即正确是难以抗拒的。西方世界的每一个权威人士一旦肯定地球是扁平的，就不许任何人指出这一错误。当权者

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并基于这种幻想创立了各种倒运的哲学。当淋巴腺鼠疫大批杀死欧洲居民的时候，当局不是烧死有罪的老鼠，而是烧死无辜的“女巫”。有两千年的时间，最优秀的医生用抽病人血的办法治疗发烧，好心地杀害了许多人，比杀伤力最大的大炮杀死的还多。

当权者错了。他们的错误造成了知识的贫乏和人类不可估量的苦难。不过他们错了并不是因为他们总是不智或邪恶的。他们错了而且一直错下去，是因为他们忠实信守的信息没有受到公开的、有竞争性的观点的有影响性的挑战。

启蒙时代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它抵制了独裁者和国王。它赞颂民主和个人自由。它承认被统治者的民主意见只有在广泛获得各种信息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在二十世纪独裁制度残酷的统治下，受控制的信息维持下来了，但这些独裁统治一直是民主的仇敌，而且最终失败了。启蒙时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最圣洁的文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了表达的自由。表达的多样性被认为是持久自由的自然状态。

现代技术和美国经济已经暗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控制信息的集中权力——全国性的公司和多国公司。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介——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电视、图书和电影——大多数已被五十家大公司所控制。这些公司在共同财政利益方面与其他巨大行业和几个占统治地位的国际银行形成连锁关系。

在占统治地位的五十家公司的控制之外也有其他传播媒介的机构。大多数是小的和地区性的，而且它们许多被大公司兼并以后，就销声匿迹了。这些微小的机构永远是重要的，它们是多样性保留下来的幸存者。但是它们微小的声音势将被庞大社会的半

数权力控制下的传播媒介的雷声所淹没。

美国拥有规模惊人的大众传播阵容。它有1,700种日报, 11,000种杂志, 9,000个广播电台和1,000个电视台, 2,500家图书出版公司, 7家电影制片厂。如果它们每一个都由不同的业主掌管, 全国就会有25,000种个别的传播媒介的机构。这样大的数目可以基本保证向人民传播全面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这就会限制权力的集中, 因为每一个业主会与其他24,999个业主一同对全国人民的思想产生影响。市场分割为这么多公司, 就意味着它们都要小一些, 这能使后来者比较容易带着新思想参加进来。

但是, 美国今天没有25,000个不同的业主。五十家大公司垄断着大部分日报的销路, 以及杂志、广播电视、图书、电影的大部分市场和对象。主管这些公司的五十位男人和女人会和衷共济。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私营的新闻和文化部。

现代技术和社会组织加剧了信息的集中控制的问题。在早些年代里, 公民间相互谈论影响着他们的政策。每一社区的公民都能聚集到一个会场或教堂里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决定其命运是真的, 因为在较古老的农业社会, 每一社区接近于自给自足, 远处的事件对它们无关紧要。这种政治活动的方法早已不存在了。代替小城镇的是巨大的都市混合体, 在那里公民对本市的大多数其它成员都不认识。没有能装得下所有选民的大厅或教堂。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由远方的强大势力安排。个人现在都依赖于传播信息和形象的巨大机构, 接受信息和教益。现代新闻、信息和大众文化系统不是近乎技术的制品。它们形成社会的舆论。

政治科学家们都相信, 尽管传播媒介不可能告诉人们想什么, 却可以引起公众想到些什么。报道的内容成为公众的日常议题。没有报道的内容或许不会永远被忽略, 但却可能在最需要的时刻

被忽略。五十家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公司在控制国家日常舆论上，比任何个别私人、也常常比任何政府机构的作用更大。

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公司由于规模巨大而成为国际金融的参与者。大多数公司迫于要与世界各地最冒险的投资竞争，而参加股票市场的交易。

乔治·莫里斯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秘书长和全国广播公司的业主，美国无线电公司是五十家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公司之一。他告诉一位记者说：“你确实必须与那些大投资者们打成一片……我办公室有一个人终年除了跟掌握美国无线电公司股份的许多机构打交道以外，什么事也不干。”

弗雷德·弗兰德里在1966年辞去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总经理的职务，因为该广播网拒绝为参议院的一次紧要的越南战争意见听取会而取消第五次日间重播“我爱露西”的节目；那时有人告诉他，由于推迟“露西”的一个片段而造成的收益损失，对于股东们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他们不会答应减少一点净利润。

艾伦·纽哈斯是最大的报团甘尼特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他告诉一位采访者说，“华尔街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尼加拉瓜瀑布城出版了一份好报纸。他们只想知道我们的利润是否会在15~20%之列。”

约翰·奈特当过六十年的主编和出版人，后来成为一家大报团奈特—赖里德公司的首脑，并成为在建设新闻机构方面的一位罕见的领导人。当他的公司准备在证券市场出售股票的时候，公司经理们亲自出席了一次华尔街分析家的会议，这些分析家帮助决定哪些最大的银行和投资商号会以大宗购买股票的方式来支持它们。奈特作了第一次表态：

我在财政安全分析家会上作了第一个发言——这也

是我最后一次发言，从此我再也没有被邀请。我的开场白是，“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想变成你们的囚犯。”我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说，“只要我与这公司还有一点关系，我们就要掌管这些报纸。”

在美国新闻史上，新闻和公众信息第一次正式与最高级的金融和非新闻业公司的控制结为一体。公众对信息的需要和公司期望“建设性”的信息之间的利益冲突已大大加剧了。

这本书描述了最近二十五年中大众传播媒介两个方面的惊人发展。一方面是五十家公司对我们的传播媒介的集中控制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广告对于受广告津贴的报刊、广播电视这些传播媒介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最近的二十五年，没有见到传播媒介的持续的衰退。许多方面改进了。新闻业成长了，这体现在其社会洞察力、戏剧和艺术上新的创造、灵活运用传播技术以及有时为社会谋利益等方面。但是这些改进却与大公司控制所产生的效果齐头并进而常常为后者所淹没。

控制着大多数我们的传播媒介的这五十家公司在方针和做法上各不相同。附属于它们的传播媒介公司的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优异，许多平平，有的恶劣。这些公司由具有不同品质和价值观的男女人士领导着。在五十家公司的大量产品中，有着五花八门的报道、观点和娱乐材料，包括有时是批评大公司的信息。

问题不是在这些公司或领导人中间存在普遍弊病的问题。也不是在一般做法上经常压制和密切监视其附属的传播媒介公司的内容问题。在五十家占支配地位的公司的产品中，有着各种各样

的新闻和观点。但是也有限制，这是大多数有私营传播媒介的其他民主国家所没有限制。当公开讨论支持工商企业庞大发展的制度时，以及公开讨论以“自由企业”这个错误的标签为名而被神化的其它价值观时，这种限制就感觉到了。

许多公司宣称允许他们雇用的新闻记者、节目制作人和作家享有很大的自由。有些公司确实允许有很大的自由。但是当它们最敏感的经济利益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母公司很少不利用它们的权力来影响公众信息。

传播媒介的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正式的美国政治制度好象是为阿克顿勋爵(注)的警句而设计的，阿克顿说：权力即腐化，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化。传播媒介的权力也不例外。当五十个公司的男女领导人控制了影响二亿二千万美国人的一半以上的信息和观点的时候，也就是美国人检查一下那些为他们提供日常世界图景的机构的时候了。

注：阿克顿（1834—1903）：英国历史学家。